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系列



陈琪与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谢辉 林芳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系列

陈琪与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谢辉、林芳著.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7

ISBN 978 - 7 - 5013 - 3787 - 3

I. 陈… II. 谢… III. ①陈琪 (1878 ~ 1925) —生平事迹

②博览会—经济史—中国—近代 IV. K825.4 F7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461 号

书名 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著者 谢辉 林芳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87 - 3

定价 45.00 元

序

马 敏

任何历史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人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中心舞台，人物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长盛不衰的永恒主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陈琪这样的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为切入点，从人物与事件的关系脉络中对近代博览会史作整体的把握与考察，恰是博览会史研究的正道。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陈琪其人的确算不上能够呼风唤雨的一流大人物，但却是一流的实干人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之“第一人”。我之所以认为他是“第一人”，主要基于：其一，陈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较早地意识到了博览会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多次亲赴海外实地考察外国博览会，热心研究和介绍世界各国博览会的情况，可谓当时最为了解博览会的中国人；其二，陈琪不仅积极宣传博览会，而且身体力行地策划和主办了中国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以事务所坐办的身份实际主持南洋劝业会的各项事务；其三，民国初年，陈琪又率领中国代表团成功地参与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展品获奖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中国曾参与的世界博览会。仅此三项成就，已足以使陈琪成为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上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就必须研究陈琪；而只有通过研究陈琪，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实际历史进程。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陈琪这样一位中国博览会史的先

驱人物却一直知之甚少，其生平和事迹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关著述即使提到他，往往也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既有相关资料缺乏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的原因，即我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聚焦于端方、张謇这类显要人物身上，而多少忽略了陈琪一类扮演“配角”的非显要历史人物。而事实上，一幕活灵活现的历史剧，只有“主角”没有“配角”，是无法上演的，也不能成其为真实的历史。就此而言，谢著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艰苦的爬梳剔抉，收集了大量有关陈琪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陈琪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其中陈琪所著《环游日记》、《新大陆圣路易博览会游记》、《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等，均是研究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正是依据这些丰富的史料，著者不仅勾勒出了陈琪尽管短暂（享年仅48岁），但却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的人生历程，而且就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及其巨大贡献，进行了颇具深度的考察，令人信服地指出：“陈琪是近代中国博览会的研究者、倡导者、实践者，也是集大成者”。

谢著的学术贡献，似又还不仅限于依据翔实、可信的史料，对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发展作了清晰、具体和系统的描述，而且更进一步，对导致陈琪获得成功或留下些许遗憾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就将我们从陈琪的个体生命空间导入了更加广阔、更为复杂、同时也更加丰富多彩的群体、国家和民族的空间，赋予人物研究以深刻的理性沉思，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启迪。

诚如谢著所言，造就陈琪其人的，不仅在于他个人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的个体因素，而更在于风云激荡的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陈琪是时代的弄潮儿。陈琪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千古变局”的动荡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经济侵略的深入，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商战”为核心的重商思潮风起云涌，席卷古老神州大地。正是在这种时代潮流下，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蔚然兴起，汇聚成为影响遍及朝野的“赛会热”，对青年陈琪

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舞台。对陈琪而言，一生变化的重要契机，便是受时代潮流和家庭的双重影响，毅然弃举子业而步入实学之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江南陆师学堂，从此养成务实的个性，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从毕业后奉派赴欧美、日本考察军事、政治，到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再到置身风云多变的晚清与民初政坛；从考察西方的博览会，到积极筹办南洋劝业会，再到组织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30年间每逢大事出，几乎都是适逢其会，折冲其间，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盖至是而先生不仅为陆军之人才，而兼为政治、外交、实业之人才矣”。“实学”与“实绩”遂成为解读陈琪人生轨迹的两个关键词，也是研究陈琪一类不显山露水，但又不可或缺的历史实干人物的重要线索。

谢著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便是将“群”的概念引入博览会史的研究，考察不同的“人群”（或集团）在举办博览会事业中的协同作用，或个人（如陈琪）如何依托于不同“人群”而因势利导，终成就一番伟业。谢著认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是官、绅、商、学各界协力作用的结果，其间有八大群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分别为：中央产业机关负责人、地方实力派、商人、华侨、博览会经理人员、驻外使臣、留学生和新学堂学生、学者士绅群体。就承担的角色来说，“中央产业机关负责人和地方实力派群体可以称为倡导决策层；商人与华侨群体是主要承办者和参与者，可以称为支持参与层；博览会经理人员群体可以称之为谋划经理层；驻外使臣、留学生和新学堂学生、学者士绅群体主要承担了宣传鼓动的作用，可以称为宣传鼓动层。”

尽管上述与博览会相关的社会群体划分是否准确、是否遗漏了部分重要人员还可商榷，但至少通过引入“群体”的概念，使我们对博览会事业参与人员的广泛和各自功能的划分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如陈琪之操办南洋劝业会，首先离不开周围协助其办事的“博览会经理人员群体”，于是，帮办向瑞琨、外事科长陈光甫、展品科长沈祚延、审查科长高彤墀、庶务

科长张铭彝、工程科长黄席珍等一批过去名不见经传，但却为南洋劝业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才开始浮出历史的水面，为人们所知。其实，同陈琪一样，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海外，亲历过国外的博览会，是一批难得的既有新思想又具有实际历练的“干才”，没有他们的参与，南洋劝业的举办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样一个办事群体的发挥作用，上离不开杨士琦、端方、张人俊等中央和地方大员群体的撑腰，下离不开张謇、虞洽卿、张振勋等绅商群体的大力协助，可以说是多个社会群体通力合作的群体协作效应。谢著已十分成功地进入了这一复杂的历史领域，给出了一幅立体、多面的博览会组织图像，但对这些不同群体和面相的探讨则还稍嫌不够深入和具体，展开也还不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资料不足的先天缺陷，不能过多怪罪于作者。相信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新的进展，我们不妨稍作等待。

前面说过，探讨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关系，难在史料，而要将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同样贵在史料的进一步开发。我还清楚地记得，2002年，当作者通过巨大努力终于找到陈琪仍健在的高龄94岁的女儿陈毓秀时，是何等的欣喜若狂。正是通过与陈毓秀的交谈，不仅寻获了一批重要史料的线索，而且通过其回忆，对陈琪有了感性的认识，进入到研究对象的世界之中，具备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是，陈琪所从事的近代博览事业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其涉及和联系的面是相当广的，仅有亲人的口述资料和一般传记性资料（如家谱等）还是很不够的。除中文资料外，我们还应给予外文资料以足够的重视。如我曾经提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班克若夫特档案图书馆（The Bancroft Library）便保存有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完整英文档案，其中涉及陈琪与中国展团的案卷不在少数，若能利用这批以及更多的外文档案，对陈琪与近代博览会的研究当更为翔实与丰满。

或许，这给作者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作者毕竟是一个全职的公务人员而兼搞学术研究，本身就极其不易，何况在攻读博士学位、撰写此书期

间又不慎摔伤致腿骨骨折，只能边卧床休息边坚持学术研究，硬是靠着一种拼命精神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并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2010年，上海将举办中国的首次世博会，这是中国继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后又一次向世界亮相，同时也将圆中国的百年世博梦。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者而言，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想，本书在此时付梓出版，无疑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其现实意义，非常值得祝贺。谨此为序。

2008年8月于北京奥运闭幕之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历程	(23)
一、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兴起	(23)
二、政府对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推动	(28)
三、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衰落	(33)
四、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推动力量	(38)
第二章 陈琪与他的时代	(59)
一、英才少年	(60)
二、踏入仕途	(62)
三、显绩东北	(68)
四、名扬美洲	(71)
五、英年早逝	(72)
第三章 陈琪与圣路易斯博览会	(79)
一、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	(79)
二、中国参与圣路易斯博览会	(85)
三、陈琪与圣路易斯博览会	(89)
四、近代中国国际博览会承办权的转移	(94)
第四章 陈琪与南洋劝业会	(103)
一、首倡南洋劝业会	(103)
二、对绅商的发动	(105)
三、艰难的筹备	(109)

四、南洋劝业会的举办	(112)
五、南洋劝业会的影响	(120)
第五章 陈琪与巴拿马博览会	(130)
一、众望所归的人选	(130)
二、紧锣密鼓的筹备	(134)
三、国民外交的发动	(139)
四、与日本的激烈竞争	(146)
五、最成功的出洋赛会	(151)
第六章 角色与作用：陈琪与张謇等在推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发展中的作用比较	(164)
一、张謇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	(164)
二、端方、张人骏与南洋劝业会	(175)
三、张静江与西湖博览会	(183)
四、角色与作用	(189)
第七章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之第一人	(196)
一、潮流的涌动	(196)
二、自身的认识	(199)
三、官员的赏识	(202)
四、商界的信任	(211)
五、浙江的基础	(216)
结语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47)
附录一：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大事记	(262)
附录二：陈琪社会关系一览表	(270)
附录三：近代中国主要博览会比较表	(275)
附录四：近代中国参与主要世博会比较表	(278)
后 记	(283)

绪 论

一、选题旨趣

走向世界，这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不是风平浪静、畅通无阻的坦途，而是一条充满了苦痛和屈辱、艰辛和曲折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历程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

博览会（英文名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在近代中国又称为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奖进会、劝工会、物产会等，一般通称为赛会，博览会一词是由日文转译的。根据《辞海》的解释：展览会是指“用固定或巡回的方式，公开展出工农业产品、手工业制品、艺术作品、图书、图片，以及各种重要实物、标本、模型等，供参观、欣赏的一种临时性组织”，组织许多国家、地区参加的产品展览会，则常称“博览会”^①。《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定义博览会为“为了鼓舞公众兴趣、促进产业、发展贸易，或者为了说明一种或多种生产活动的进展和成就，将艺术品、科学成果或工业制品进行有组织的展览”^②。博览会的基本含义有三：（1）展览观摩；（2）奖励比赛；（3）推广销路^③。按其范围可分为世博会、国际博览会、全国博览会、地方博览会。按其展示的性质，又可分为不同的专门性博览会，如美术博览会、卫生博览会、商业博览会等。不论上述哪种形式的博览会，其实际上皆希望透过展示活动，进行经济交流、商品宣传、开展贸易

活动和资讯交换等目的。在近代中国，一般称出洋赛会为万国博览会，这实际上包括了世博会和国际博览会。主要是因为对世博会的认定一开始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从19世纪后半叶起，欧美诸国频频竞办世博会。但由于缺乏管理和规范，出现了准备不足，草草举办，同一时间内各地区重复举办等诸多问题。为了规范运作，1928年11月，在巴黎召开了有关世博会问题的国际会议，有3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签订了《国际展览公约》，并正式成立了具体的管理机构——国际展览局，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公约”明确了世界博览会的性质、频率、举办方法，以及主办国的责任和参加国的义务。这是博览会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世博会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鉴于以上原因，关于早期世博会的举办情况，各国出版的专著以及各种版本的辞典各有不同的说法^④。博览会和博物馆有着密切的联系。最早的时候，博物馆只是皇族权贵聚珍敛宝的收藏室，到18世纪末，博物馆才逐步向公众开放。和博物馆相比，博览会的基石不是丰富的藏品，而是广泛的联络和交流，其展示内容的辉煌，远远超过了博物馆。可以认为，世界博览会是“对当世文明的记录，对未来发展的瞻望”^⑤。然而，许多届的博览会最后都成了博物馆的基础，博览会的一些令人惊叹的新鲜展品，成了永久性藏品，成为博物馆中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物。

关于博览会的起源，一般认为应追溯至中世纪欧洲地区的商业“市集”活动。当时欧洲许多城市因地理位置和其他有利贸易的条件，而成为商业中心，其中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德国的科隆、汉堡，英国的伦敦等地区的市集，每年可从1月一直延续到10月左右，来自各国、各地的商人，可在此进行农产品、日用物品的交易，这样的市集活动，就成为日后近代博览会发展的基础^⑥。而所谓近代的博览会发展，乃起源于工业革命后，博览会是近代文明发展和近代化的产物，“溯博览会之起源，实始于1798年法国巴黎之工业赛会”^⑦。此后，各国即群起仿行，各类赛会活动层见叠出，蔚然成风。当时举办的博览会都属国内性质，注

重于本国工商产品的展示,对于提升当时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助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交通的发展,举办世界性展览的条件逐步成熟,1851年,正处于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英国为展示其强大国力,在伦敦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是为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世博会成为国际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此后各国竞相举办,很快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举办博览会的热潮,“几乎无国无会、无年无会,而赛会遂成为实业竞争上之一重要机关”^⑧。博览会活动逐渐融入一般民众的生活之中。

近代中国博览会是欧风东渐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已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自然难免卷进从西方刮起的“赛会热”。就如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有“走向世界”的必要而自觉主动开放的,而是英国侵略者的鸦片和大炮冲开的,近代中国博览会的产生也是被动的。虽然上海商人徐荣村以自己经营的12包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了第一届伦敦世博会,引起轰动并夺得金银两项大奖^⑨。但这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而是把博览会视为赛珍耀奇的无益之举。对于各国发出的参加世博会的邀请,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来推托^⑩。将国际博览会参展事务交由以外籍总税务司赫德为首的晚清海关办理,草率从事,徒引外人讪笑。到1905年左右,方才有所醒悟。商部专门订立《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对华商参加国际性博览会作了统一规定,并要各省商务局和各地商会鼓励厂商“精择物品”,踊跃赴赛^⑪。改变了以往“委诸税司采办,徒滋笑柄”的窘境,结束了长期以来由外国人控制中国参展国际博览会事务的局面。这大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参与博览会的热情,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迅速升温,出现了遍布全国的博览会热。在出洋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的同时,模仿西方和日本举办各种国内博览会。正视自己,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

随着近年来我国会展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成功举办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和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获得成功,中国近代博览会史日益受到

人们的重视。在申博百年梦圆的时候，加紧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回顾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历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为题，对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作一个微观的个案研究。

一些历史人物，在世时经历各种重大事件，始终处身时代旋涡中心，虽非显要，即是良好见证。但因为不是主角，忠奸两面都轮不到，身后因时势变化，其名愈隐而不显，其事甚至湮没无闻^①。陈琪便是此类人物中较为典型的一位。其有生之年不过四十有八，可是从洋务运动兴起，到清末新政推行，再到辛亥革命爆发；从奉派赴欧美、日本考察军事、政治，到随五大臣考察政治，再到置身风云多变的民初议会政治，30年间每一大事出，几乎都适逢其会，或任重要配角。更重要的是，一部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与他息息相关。从考察西方的博览会，到积极倡导博览会事业，到筹办南洋劝业会，到组织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留下了他的印迹。在我们这个讲级别（职称）的时代，陈琪上不了《浙江人物简志》^②、《浙江近现代人物录》^③（因为他大概算不上正厅，也不是教授）。因为缺乏资料，关于他的记述少之又少，仅有的记述也颇多错漏。如有学者误认为时任南洋劝业会坐办的陈琪（陈兰薰）是上海大商人^④，有的记述遗漏了陈琪1918年竞选担任浙江省议会副议长的重要史实^⑤，有的干脆说陈琪竞选失败了^⑥，没有遗漏的也搞不清年份^⑦。总之，我们对他还是不甚了了，对他的生平、他对博览会的发起和筹办、他的博览会思想和主张知道得很少。

陈琪（1878-1925），浙江青田人，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当过湖南武备学堂监督、两江督练公所主任、陆军第四中学堂总办、创办过《南洋兵事杂志》；担任过奉天劝业道，创办了奉天兴业银行；曾随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担任过国会议员，出任浙江省议会副议长，在他并不漫长的人生中，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史上都留下过影响。尤其在中国从睡梦中惊醒，终于迈开近代化的步伐时，陈琪敏锐地意识到博览会在推动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重要作用。多次考察国外博览

会,研究和介绍世界各国博览会的状况,积极宣传举办博览会的作用,策划和主办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担任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坐办),筹备参加了近代中国最成功的出洋赛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担任筹备巴拿马事务局局长兼赴美赛会监督处监督),在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必须研究陈琪,而研究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也就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状况。

二、研究史概述

(一) 研究概况

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起步甚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看不到专题研究论文^⑨。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大规模的商会档案整理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者注意到商会组织参与博览会这一重要经济功能,利用新整理的商会档案,开始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笔者所见国内最早的博览会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是马敏的《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一文,随后作者又发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清末博览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说。论文发表后,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共鸣,相继有朱英的《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汪岳波的《晚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述略》(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翔的《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等论文发表。此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似又归于沉寂,除王翔、黄锡明的《民国博览会纵览》(《民国春秋》1993年第2期)一文外,整个九十年代中上期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论文。直到1999年云南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前后,这方面的研究才得到重视,

并随着上海 2010 年世博会的申办和取得最终成功而趋于活跃。代表性的论文有：梁碧莹的《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刘世龙的《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振兴政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 3 号，1998 年 12 月）、马敏的《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 年 6 月 18 日）、董增刚的《晚清赴美赛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朱英的《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马敏的《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乔兆红的《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 年第 2 期）、马敏的《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等。

台湾学者利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清末外交档案中“赛会公会档案”这一珍贵档案史料，对清末中国参与万国博览会的历程作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代表性的论文有古伟瀛的《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1986 年第 3 期）、赵佑志的《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5 期，1997 年）。另外，主要是针对台湾举办博览会和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历史作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吕绍理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之研究》（收入周惠民主编《北台湾乡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 年）、庄义芳的《殖民统治与产业大展（1935）——以日据“始政四十周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的呈现》（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 年 5 月）。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也相当关注，并有较深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而兴起的^⑨。著名学者野泽丰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他的《1903 年大阪博览会与张謇来日》（《经理研究》第 14 期，东京，1971 年 3 月）、《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 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 154 号，译文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

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三文分别对张謇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清末南洋劝业会、民初中国博览会事业作了较早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另外代表性的论文还有：吉田光邦的《1910年南洋劝业会始末》（收入作者编《万国博览会研究》，日本思文阁出版社1986年版）、小岛淑男的《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东南亚华侨》（收入作者编著的《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版，译文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铃木智夫的《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爱知大学《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9月）。

另外，一些博、硕士生以中国近代博览会作为研究对象完成的学位论文也值得重视，如谢辉的《西湖博览会研究》（杭州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苏文清的《始政四十周年台湾博览会宣传计划与设计之研究》（台湾科技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郑建华的《台湾日治时期博览会活动设计及其视觉传达表现之研究》（台湾科技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程佳惠的《1935年台湾博览会之研究》（台北中央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最近整理成《台湾史上第一大博览会——1935年魅力台湾SHOW》一书，台湾远流出版社2004年版）、乔兆红的《商品赛会与湖北早期现代化——以武汉劝业奖进会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沈惠芬的《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洪振强的《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虽功力未臻完善，论述未必精当，但由于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深化和视野的开拓是有益的。

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著尚付阙如。最早涉及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著大约是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书中对张謇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特别是参与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有简略的评述。潘杰著《中国展览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